

作者、写作、版本与内容等方面考察《纪事录》之优缺点,肯定它在明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价值。何朝晖《俞安期生平、著述与刻书活动考》对晚明山人、诗人、出版家俞安期的生平、著述和刻书活动进行了考述。解扬《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实用追求》讨论了《经济类编》在编纂初衷、采录文献上的特点和入选文论被冯琦使用的情形。衣若兰《明清方志女性传记编纂》考察了明清方志中女性传记的编纂方法与书写内容。张士尊《明代辽东文化结构研究》探讨了明代辽东地区带有多元倾向的文化结构及其政治取向。秦海滢《虚与实:士人价值观念在宗教空间的构造》认为,明清士人的宗教信仰已与自身理性巧妙结合,并在生活与意识层面实现无条件转换。章宏伟《明代版画研究的几个问题》认为,明代木刻版画是中国传统版画的巅峰时期,版画的区域风格日渐彰显,并且借鉴了西洋技法。

六、刘基专题。(新加坡)李焯然《帝王师:刘基的治国理念》探讨了作为帝王师的刘基之治国理念。谢贵安《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述与塑造》分析了“明实录”中刘基形象的塑造及其方式。吴仁安《明代温州地区一个与朱明皇朝相始终的江南望族》对刘基家世渊源、家族及其后裔进行了考述。〔法国〕马骊《明太祖与刘基》认为,朱元璋与刘基之间关系复杂,配合、猜忌、离合变故导致刘基功成身退。王雪华《论影响刘基事业走向的诸种因素》认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日益滋长的“帝王心态”、淮西集团的阻挠以及刘基的刚直个性和仕元经历成为制约其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彭勇《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认为,所谓刘基“密奏立军卫法”之说不能成立,但这一说法事出有因。江心力《刘基对儒学的反思析论》指出,刘基继承、发展了程朱元气说,发挥了儒学心性论,所著《春秋明经》为儒学注入了新内容。李向荣《〈郁离子〉廉政思想对当下反腐倡廉的启迪》认为,《郁离子》寓言故事在于以贪利为祸警示世人,倡导为官要廉洁清正,这对反腐倡廉具有启示意义。俞美玉《刘基所立之德》认为,刘基“德”的核心是至诚品质,是“诚于己、诚于事业、诚于社会”的三位一体。陈守文《刘基与叶适比较研究》认为,刘基是“瓯”文化中英雄文化与才子文化的典型代表,其诚信观念是“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龚剑锋、黄彪《刘基等“浙东四先生”对大明立国的贡献》则从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分析了刘基等浙东四先生在明朝建立与巩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庞乃明)

## “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 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1年5月28日至30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暨澳门民政总署、澳门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逐波泛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陶瓷外销与物质文明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两岸三地、东南亚、欧洲、美洲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19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在香港、澳门两地召开,包括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演讲厅进行的学术研讨活动(28日—29日上午),以及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澳门北湾出土外销瓷片展”开幕式、学

术研讨及澳门博物馆参观活动(29日下午—30日)。研讨会议题的重点有关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外销背景下物质文明扩散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专家学者们在会议期间交流最新学术成果和研究经验,使相关课题得到深化。

研讨会首先由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致开幕词,对中国瓷器外销及中西交流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给予肯定,并对学界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会议原计划邀请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主题发言,会前却不幸接到徐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2011年5月22日),会议期间主题发言改为悼念仪式,由郑培凯教授宣读悼词、主持默哀仪式。而后,郑培凯作为中国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组负责人,对小组自2007年以来的研究课题及成果进行论述,介绍了于上川岛、澳门等地发现的一手外销瓷材料,探讨中葡贸易及陶瓷外销等相关问题,为认识中国外销瓷在早期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重要参考。之后,会议进入研讨环节,与会者就16至17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物质文明扩散的历史课题相继发言,并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由于会议齐聚各领域资深专家,不同角度与视野的交汇碰撞令研讨十分精彩。现就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外销瓷的新发现及相关历史问题。近年来,随着考古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开展,有关16至17世纪中国外销瓷的新发现接连不断,此次与会的部份专家介绍了最新的发现,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肯尼亚发现的中国瓷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他负责的中国瓷器调查组,对以往肯尼亚沿海地区的一些古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秦大树介绍了格迪(Gedi)古城、耶稣堡(Fort Jesus)等重要遗址及蒙巴萨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探讨了葡萄牙人对印度洋贸易控制的发展和变化。栗建安(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则对近年来水下考古的工作简况进行报告,并就最新发现的16—17世纪中国外销瓷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着重介绍了福建平潭县牛屎礁、九梁礁、“碗礁一号”沉船遗址,广东“南澳一号”沉船遗址以及海南西沙群岛晋卿岛沉船遗址出水的景德镇窑和福建邵武四都窑、漳州窑、德化窑等外销产品,结合瓷器相关窑址及海外发现,以福建窑业为例,探讨了外销瓷器的生产、贸易以及消费等问题。

成耆仁(台湾艺术大学造型所)对台湾近年来发掘的陶瓷贸易相关遗迹进行介绍,并与近十年来国内外陆上及水下发掘所见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外销瓷器相结合,复原经泉州等港口出海,由台湾转口至日本、东南亚、欧洲及非洲等地的瓷器外销情形,以证实这些遗址所见中国外销瓷器与欧洲人东来经营贸易及荷据时代转口贸易的密切关系。卢大成(澳门艺术博物馆中国陶瓷馆)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历史,尤其是作为中葡贸易重要港口的北湾地区,其历史沿革及后期改造活动等进行论述,并对北湾发现的外销瓷器碎片进行了详尽介绍,认为其应能代表葡人16至17世纪在澳门进行瓷器贸易的内容。而与北湾所见形制或纹饰相类的瓷片在海外的大量发现,亦证明澳门在中西海上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地理与历史作用。刘朝晖(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则通过对香港竹篙湾出土瓷器的调查分析,讨论了竹篙湾遗址的性质及明代瓷器外销等问题。认为竹篙湾瓷器的上限可早至明初,下限可晚至万历年间,而竹篙湾则可能为走私贸易港口。他还指出,竹篙湾应位于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瓷器贸易航线上,葡萄牙人东来后,竹篙湾所倚靠的大屿山很可能是葡文文献中提到的Tumon岛。此外,赵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所)对波斯湾巴林岛卡拉特巴林遗址出土的16—17

世纪中国瓷片进行介绍,探讨该时期的贸易网络 and 消费文化问题。

二、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外销瓷器贸易相关问题的探讨。对于此时期外销瓷器类型的问题,庄良有(菲律宾华裔文化传统中心)强调,16—17世纪中国参与外销贸易的瓷器包括为迎合欧洲新品味、新市场而生产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和以亚洲为主要市场的福建漳州窑产品。相对于景德镇产品在欧洲受到的追捧,质量相对粗糙的漳州窑瓷器则受到亚洲消费者的欢迎。卢泰康(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则从台湾与海外出土的贸易瓷器入手,对明末清初中国瓷器外销的贸易路线、外销瓷器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整体观察,认为明末清初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人在亚洲的贸易活动,造成贸易多元路线的形成。而在外销瓷器的特征上,一方面是如漳州窑一类新兴窑厂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响应外来消费者的需求,在短时间内出现器物纹饰与造型的创新与调整。

对于此时期的文化互动问题,李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蔻岑考古研究所)着眼于16世纪晚期开始的中国—西班牙贸易,强调对传统亚洲贸易网络与新开辟的跨太平洋贸易航线的融合所创造出的文化碰撞及海洋文化新景观的理解。

对于中国瓷器外销的市场与消费群体等问题,柯玫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对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外销瓷器进行整理,认为这批瓷器于19世纪购自伊朗,多属于16—17世纪,可以藉此窥得该时期外销中东的中国瓷器概貌。她根据器物风格的转变将这批器物以两个时段分别介绍,并对卡加王朝时期(1794—1925年)中东地区对中国外销瓷的二次加工工艺进行了一定探讨。雷纳尔迪(Maura Rinaldi,意大利独立研究员)则透过美第奇家族收藏,探讨葡萄牙打开印度航线后,意大利佛罗伦萨商人对海上贸易的参与情况。此外,柯黛尔(Christine Ketel,莱顿国际遗产活动中心独立研究员)通过对17世纪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返程货船及在亚洲贸易网络之间航行船只的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贸据点的考古发现(包括附近海域沉船)以及荷兰本地所见的纪年材料,探讨当时荷兰对中国瓷器的运销情况,认为当时出口荷兰的瓷器主要包括专为欧洲市场烧制的克拉克瓷与中国日常使用的民窑瓷器等,而沉船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有关发现,亦描绘出荷兰参与东方贸易的概况。

三、克拉克瓷专题研究。江建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根据考古数据和相关出土纪年数据及文献,探索了景德镇地区生产的克拉克瓷的烧造年代及相关问题,认为其大约兴烧于明万历元年以后,大规模烧造于明天启、崇祯时期,清顺治时期已经基本停烧,并得出克拉克瓷仅是晚明外销瓷产品中的一个品种,所占生产份额极小,是为适应欧洲大陆市场及审美需要而烧制,其装饰构图受伊斯兰陶瓷影响,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佛教和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等结论。曹建文(景德镇陶瓷学院)则认为“克拉克瓷”的内涵非常复杂,广义上几乎是15—17世纪中叶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外销的中国瓷器统称,其风格为繁密而连续开光的青花装饰,这种器物早期外销的市场应是西亚的伊斯兰地区而非欧洲,但受贸易关系所限供不应求,直到16世纪中期葡萄牙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帝国后,才得以直接推动景德镇克拉克瓷器的生产。故克拉克瓷器产生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西亚商人与中国商人所进行的贸易过程中。

李宝平(悉尼大学考古系)对江西南部晚明纪年墓及景德镇观音阁窑址所发现的克拉克瓷器材料进行了分别介绍,认为绝大多数明墓中所见克拉克瓷都属残次品,并得出克拉克瓷是

专供外销而生产的观点。甘淑美(荷兰莱顿大学)则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克拉克瓷贸易进行讨论,认为克拉克瓷器盛产于1573年到17世纪上半叶,以海外需求为主要市场。

此外,亦有跨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瓷器外销及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金国平(葡萄牙中国学院澳门研究中心)聚焦于一件收藏于贝雅唐纳·莱奥诺尔博物馆的1541年别球佛哩定制瓷器,对其图饰、产地及定制途径分别进行考证,认为其出现证明1521年—1540年这段文献数据记载甚少的时期,葡属印度与华南海岸之间有着非官方的商业贸易活动,是重塑双屿(Liampo)港时期中葡关系的重要实物。而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从宏观的角度,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实物遗存相结合,探索了明代青花瓷器崛起成为主流的历史进程,认为青花瓷在明代普及于全国,而宣德、嘉靖和万历三朝是青花瓷发展的高潮时期,此时中国本土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的完成,推动青花瓷形成中国瓷器主流。瓷器外销推动青花瓷走向世界,从而再催生出万里同风的中外文明会通的过程。

会议期间,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参观了于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澳门北湾出土外销瓷片展”,并前往澳门博物馆,参观澳门出土的部份外销瓷片,对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商讨,成果颇丰。本次国际研讨会的成功举行,进一步推动中国瓷器外销历史及中西海上交通、贸易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在促进中外学术界的沟通、交流与学术信息的共享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我们亦体会到,16—17世纪中国陶瓷外销及相关历史课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学者任重而道远。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将在近期集结出版,以饕学界。

本文初稿,由“陶瓷下西洋”小组研究助理王冠宇记录整理,特此致谢。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郑培凯、范梦园)

## 2010年“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19—22日“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的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自2008年中国社科院与宁波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携手共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研讨会为加强合作又书写了新的一页。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含提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科举文献研究。本次会议着重研究天一阁藏科举录及其他科举文献。

鹤成久章在《天一阁明代登科录大型藏书之谜——兼论传入日本的〈明代登科录〉》中,不仅指出了天一阁所藏明代登科录具备系统性强、规模大的特点,还将日本现存中国明代的科举录情况进行了介绍。贺宇红的《天一阁馆藏文献与科举研究》则指出,除了天一阁所藏各种科举录外,馆藏文献中的地方志、谱牒等,亦是科举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王宏星《天一阁藏明天台卢氏科举考卷、圣旨、家乘考论》考察了天一阁博物馆收藏的明成化年间天台卢浚会试考卷、卢氏家乘及圣旨的重要价值。施祖青的《天一阁收藏明代科举文献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个